

当代汉语

日源外来语研究

杨文全 杨昊 著



四川大學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项目策划：梁平  
责任编辑：敬凌玲  
责任校对：于俊  
封面设计：璞信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汉语日源外来语研究 / 杨文全, 杨昊著.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1. 6

ISBN 978-7-5690-3066-2

I. ①当… II. ①杨… ②杨… III. ①汉语—外来语—研究 IV. ①H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02202 号

### 书名 当代汉语日源外来语研究

---

著者	杨文全 杨昊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3066-2
印前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9
字数	239 千字
版次	202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2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 85408408 / (028) 85401670 /  
(028) 86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 目 录

第一章 概 论	( 1 )
第一节 汉语借入外来语的历史述略	( 1 )
第二节 本书基本概念界说	( 11 )
第三节 日源性成分的研究价值与思路	( 67 )
第二章 外来语研究现状概况	( 71 )
第一节 外来语研究的维度	( 72 )
第二节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汉语外来语研究	( 75 )
第三节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汉语外来语研究	( 87 )
第四节 现存的不足与本书着力研究的方向	( 103 )
第三章 日源性成分的借入类型与语音及词形变异	( 107 )
第一节 日源性成分的借入类型	( 107 )
第二节 日源性成分在汉语中的音节与词形变异	( 129 )
第四章 日源性成分的原语义与其在汉语中的语义变异	( 140 )
第一节 日源性成分的原语义与在汉语中的词义变异	( 140 )
第二节 日源性成分融入汉语后的语义变异类型	( 152 )

第五章 日源性成分的结构形式与句法功能·····	(184)
第一节 日源性成分的原结构与功能及其在汉语中的变化 ·····	(184)
第二节 日源性成分的结构与功能在汉语中的变异类型 ·····	(212)
第六章 日源性成分的汉化及其对汉语词汇面貌的影响 ·····	(215)
第一节 日源性成分的汉化及其表现·····	(215)
第二节 日源性成分对汉语词汇面貌的影响·····	(219)
第七章 结 语·····	(226)
第一节 日源性成分借入汉语的汉化路径与机制·····	(226)
第二节 本书研究尚存的不足·····	(229)
附表 1 当代“汉日融合词”释义举例·····	(231)
附表 2 当代汉语“日源外来词”词表·····	(237)
附表 3 现代汉语“日源性外来词”词表·····	(241)
附表 4 现代汉语“外来词来源”词表·····	(249)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78)

# 第一章 概 论

## 第一节 汉语借入外来语的历史述略

### 一、汉语外来语发展历史的分期观点

词汇互借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世界上的任何语言都可能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来丰富自己的词汇系统，增强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汉语借鉴其他语言词汇的历史比较悠久，学术界对外来词引进汉语的历史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分期观点。对此，韩淑红（2012）将各家分期及分期依据归纳为如下几点：①粗线条的时间标准；②历史事件的主流标准；③引进外来词的语源标准；④汉语史分期的标准；⑤引进高峰的标准。她还将诸多观点总结归纳为“二分说”“三分说”“四分说”“五分说”“六分说”。<sup>①</sup>

（1）“二分说”：古与今。

“二分说”以李行健、余志鸿（2005）为代表。该说立足于现代汉语，把古今汉语一分为二，对古代汉语阶段不再细分。这一分期说显得过于笼统，不利于对外来词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细

<sup>①</sup> 韩淑红. 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研究综述 [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3): 53-55.

致深入的描写和分析。

(2) “三分说”：上古、中古和近代。

“三分说”以王力(1982)为代表。该说未将现代汉语阶段纳入，应当说有相当的缺陷。虽然采纳该说的学者彼此仍存在一定分歧，但也大多遵循王力的标准。

(3) “四分说”：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

“四分说”以苏新春(1994)、汤志祥(2004)为代表。该说在“三分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外来语的现代汉语引进时期，对古汉语阶段没有进行新的划分。

(4) “五分说”：西汉以来引进外来词时期、梵语影响时期、13世纪蒙古语影响时期、1644—1911年满语影响时期、近代欧美科学影响时期。该说以高名凯和刘正琰(1958)、史存直(1989)、潘允中(1989)为代表。“五分说”专注于词汇史的整体研究，分期更加细致，特别突出了外来词在每个时期的主要影响。

(5) “六分说”：西汉时期、东汉魏晋及隋唐时期、明朝末年、戊戌变法前后、五四运动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六分说”代表人物有吾三省(1989)、胡开宝(2005)等。该说显示了对汉语外来词引进历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不仅对汉代提出细分观点，而且对鸦片战争后再进行细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有为也持“六分说”，但与吾三省、胡开宝有所不同，他主要根据时间链条，其分期具体为：远古时期、上古（先秦两汉）时期、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近古（宋元明清）时期、近现代（上）时期（清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近现代（下）时期（20世纪下半叶）。

学者们现有的分期均存在某种不足之处，如有的忽视先秦这一开端时期，有的则忽视了宋元这一重要时期，即使是对汉语外来词研究颇有成就的持“六分说”的史有为，其学说也忽略了近

三十年来日源和英源外来词大量引进的这一历史时期。

## 二、汉语借入日源外来语的历史阶段

史有为(2016)认为<sup>①</sup>,作为正式的科学术语,“外来语”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具体说来,“外来语”一词是20世纪初年从日语借入的(1902),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该词主要限于完全或部分音译的词,也指从日语借入的训读<sup>②</sup>汉字词。

### (一)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概说

汉语是一门相对成熟的语言,不仅固有词汇量丰富,而且具有比较完善的造词功能,所以汉语中外来借词在汉语词汇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从整体来看,汉语新词语中的外来借词以英语借词为主,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日语和法语借词。

由于日语与汉语同属汉字文化圈,而且从历史、地理位置、文化和经贸交流上比其他语种进入汉语更具有优势,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明确日语借词在汉语中的地位,对日语借词的研究和汉语词汇本身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汉语借入日语借词的历史阶段,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的观点有:

顾江萍(2012)<sup>③</sup>认为,日语借入汉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古代汉语时期(这个阶段的日语借词主要是以

① 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 [M]. 2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3-14.

② 训读(訓読/くんどく), 日文所用汉字的一种发音方式, 即汉字在日语中按照日语的译音读出来, 与音读(音読み/おんよみ)即日语模仿汉字在汉语中不同时代的读音(吴音、汉音或唐音等), 有很大的不同。

③ 顾江萍.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1-2.

音译汉字词的形式出现)；第二个阶段是晚清至民国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中国，大量日语借词随之诞生)；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即一般人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汉语”时期)。

但学术界公认的日语借词被引入汉语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晚清至民国初年(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日语借词引入汉语的高潮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当时中国受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国内学者自行翻译西方著作的力度相当有限。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使得我国大批仁人志士反思并转而向日本学习。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现代汉语的形成期，面对外界涌入的大量新事物，汉语固有词汇自身的不足日渐突显。加之20世纪初的留日热潮，伴随着大批留日学生大量翻译的日本著作，许多日语词汇被引入汉语之中。这一时期翻译的日本著作，大部分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翻译的西方科技类著作，因此这个时期引入的日语借词主要以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名物术语为主，其中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达844个<sup>①</sup>，如文明、社会、经济、革命、共产主义等。其中大部分已经彻底为汉语同化，成为汉语词汇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词汇。正如高名凯、刘正琰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言的词都是通过日语传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sup>②</sup>因具体数量实难以考证，为此国内有不少学者对这个“许多词”到底是多少曾有所质疑；不过这一时期日语借词的引入对于现代汉

①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M]. 谭汝谦, 林启彦,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326-335.

② 高名凯, 刘正琰. 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研究 [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158.

语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之后的几十年，由于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语言之间的交流几乎陷于停滞。

1972年，中日邦交迎来正常化。特别是随着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上的交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迎来了日语借词引入汉语的第二个高潮。日语借词引入汉语，除了通过中日之间直接的文化交流、经贸交流外，经由港、澳、台等地语言的辗转引进也是一个重要渠道。特别是跨入21世纪之后，随着网络通信的发展，使得日语借词的引入渠道日趋多样化。

## （二）汉语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及其特征

### 1. 2006至2010年间汉语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了帮助社会公众了解语言国情，于2004年9月成立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分年度搜集、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的基本状况及其热点问题，之后陆续推出当年度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自2006年始，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又陆续推出当年度的汉语新词语；截至2010年共采录2234条新词，其中直接来自日语的有阿鲁族、草食男、钝感（力）、多忙时代、干物女、婚活、就书、M型社会、萌、秒杀、轻熟女、熟年、宅、宅女、正太等73个。此外，受日源词缀~化、~手、~团、~族等影响而形成的新词数量庞大。其中“~族”有奔奔族、吊瓶族、飞鱼族、合吃族、急婚族等，达239个之多。

国家语言资源检测与研究中心（网络媒体分中心）BBS<sup>①</sup>语料库中的日语借词网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

<sup>①</sup> BBS的英文全称是Bulletin Board System（即“电子布告栏系统”），在国内一般称作“网络论坛”。

体”。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4.85亿人，普及率升至36%；我国微博用户达1.95亿，使用率升至40.2%<sup>①</sup>。网络用语成了一种汉语新语体，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等多种语码混杂的现象突出，而网络用语相对集中使用的主要是网络论坛（BBS）。据统计，截至2012年6月30日，共产生了869个网络词语，其中日语借词就有3166、KUSO、北斗神拳、残念、大好、大丈夫、恶趣味、姐贵、控、口癖、苦手、萝莉、萌、米国、欧巴、素颜、兄贵、御姐、正太、最低、最高等22个<sup>②</sup>。以上日语借词，大多是直接借形借意，其中也显示了BBS用语的特征：书写便利，几乎都是对日语未加任何修饰的直接引用。

### 2. 汉语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及其特征

汉语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意译、音译、借形、混合等形式多样，凭借与汉语通用汉字的优势，借形词仍占绝对优势；词义上有意义完全相同、词义范围扩张或缩小、意义发生转移、感情色彩发生变化等几种情形，总体而言仍然基本借用了日语借词的传统特色，不过，新时期的日语借词也带上了若干的时代特征。

(1) 关联性强。与以前的日语借词相对独立相比，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关联性比较强，其词义拓展空间很大，如从“おたく”（OTAKU，御宅族，足不出户的动漫迷）到“宅男”“宅女”“宅婚”，还引申出“御宅文化”“宅经济”等。另外，其中作为类词缀的“宅”，在汉语新词的创制过程中，已具有非常强的造词功能。

<sup>①</sup>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

<sup>②</sup> 赵康英，王保田。从语言接触角度看新时期汉语中日语借词的回流[J]。现代语文，2013（6）：125。

(2) 词性及用法灵活。作为新词语出现的日语借词，没有形成十分稳定的含义，所以用法非常灵活。如“萌”可以当名词用，可以用来解说“萌”这种概念；也可以当动词用，如“47岁的大妈‘萌’起来像少女”；还可以当形容词用，如“你好萌萌哦”“萌妹”“萌叔”等。

(3) 词义变化迅捷。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概念模糊，很多词语因为没有汉语权威词典的解释，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词语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如“宅男”，有人理解为“动漫发烧友”；有人理解为经常窝在家里不出门的男人，与有无特殊爱好或是何种爱好无关；有人一开始理解为“动漫发烧友”，后来又理解为某一方面有专业技能的人。当然，这一特点源于日语借词本身意义的不确定性，“萌”作为2004年度日语流行语，日语国语词典还未将其收录，所以在日语中的词义还未最终确定。而“OTAKU”一词虽然已被日语国语词典收录，但在原来三种词义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词义：“（俗）ある物事に異常なほど凝っている人をいう語。”而且这个词在日本国内的用法还在变化。所以“多变”成了日语借词的一大特征。

(4) BBS用语借用更直接，但使用群体相对狭小，主要流行于日本动漫迷中。比如“大丈夫”一词，因为与汉语“大丈夫”写法完全相同，如果没接触过日语，不可能在表达“没关系”时想到“大丈夫”。因为网络用语只写汉字不需要发音，所以这类词的直接使用，对于动漫迷来说最好是保留源语原义，这就注定了这类日语借词在汉语中的普遍接受度不会高。

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真正能被广大群众所熟知并完全接受的并不多。不只是日语借词，每年的汉语新词语公布时，包括知名学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对此有些置疑。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词语除了新颖之外并不是社会用语的主流，不具备普遍性。但

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采集的这些数据，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以动态语料库为基本手段，对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育教材以及海外华语等的语言状况进行动态的采样分析”<sup>①</sup>采集而来的。从使用群体看多为年轻人、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的人，因为这些人接触新事物多、接受新事物快，这也正符合新事物产生的规律。其中不少词语是以流行语的形式出现在汉语中，至于最终能否留存于汉语中，以何种词性、何种词义留存下来，需要经过社会语言实践一系列自然的淘汰选择，因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些词语给汉语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丰富了汉语言文字的表现力以及汉语文化的内涵。

### （三）从汉语新词语看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

（1）汉语新词语中，虽然日语借词占外来借词的比例有大幅降低，但也仅次于英语借词稳居第二，对汉语的影响趋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日语借词在外来借词中的排位从第一降至第二；数量上，从第一次高潮的49.16%下降至10%~20%之间（见表1.1）。

表 1.1 外来借词的数量及比例变化

时间	外来借词数量	英语借词数量及比例	日语借词数量及比例
清末民初	2 738	1 196 (42.98%)	1 368 (49.16%)
1975—2005 年	1152	988 (85.8%)	127 (11.0%)
2005—2010 年	383	296 (77.3%)	73 (19.1%)
2012 年 BBS 语料库	185	151 (81.6%)	27 (14.6%)

<sup>①</sup>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5) [R].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在汉语史上,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大规模地引入日语借词的情况实属罕见,所以,第二次日语借词的引入高潮时,日语借词回归其正常的地位,汉语对日语借词的接受度也趋于理性。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作为小语种,日语借词已遥遥领先于其他语种。在新时期外来借词中,英语是最为主要的来源语种,日语次之,这种格局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sup>①</sup>。

(2) 从借用词源上看,日语固有词对汉语的渗透有所增强。第一次高潮中引入的日语借词,绝大多数为日译西学的科技术语,真正源自日语的固有词汇为数不多,而新词语中的日语借词,如干物女、婚活、控、萌、秒杀、宅等,大多数来自日语固有词汇,具有非常典型的日语特征。新时期日语借词中日译词语的减少,原因有很多,不过最重要的有两点:①我国目前社会开放程度较高,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和紧密,不必再像以前那样依靠日语作为中介,来译介西方的先进文化。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革文字制度,引进新的外来词一般采用音译的方式并用平假名记录,日语中汉字的数量有所降低,日语本身已经不具备向汉语输出汉字词的绝对优势。第一次高潮中,日语借词的引入,对汉语的影响体现了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著作时的严谨作风以及对语言美感孜孜以求的态度。日语对西方著作的这种简约翻译,对我国外来语翻译工作具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在第一次日语借词的引入高潮中,日语借词的引入对汉语的发展可谓意义不凡、影响深远。但是,如果从词语概念的角度出发,这一时期日语借词的引入只是起到了一个中间媒介的作用;而新时期引入的日语借词,不仅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而且一定程度上通过文字带来一种文化上的影响。从这一点看,日源外来语通过“汉语化”参与汉语二次造词,对汉语词

<sup>①</sup> 李彦洁,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

汇构造以及汉文化的影响力得到了强化。

(3) 从造词功能上看,词缀化构词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在2006—2010年产生的2 234个新词语中,“~族”239个,占整个新词语的10.7%。汉语中词缀自古就有,词缀化是汉语本身发展的自然趋势。可以说汉语词缀法在现代汉语里本来就是能产性较高的构词类型,而日语借词只是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一些新的词缀,从而加速了汉语词缀化的发展。

(4) 从网络用语借用方式上看,形式新颖。虽然不具普遍性,网络用语的日语借词中直接借形、借意占绝对优势,而且借用频次相对较高。这可以说是日语借词给汉字带来的最大便利的体现,也是其影响汉语的优势所在。在2012年BBS语料库数据中有23个日语借词。从词形看,有18个直接借形,3个借音,2个借意;直接借形的占78.26%。从词义看,有17个直接借意,7个转义或引申,直接借意占73.91%。大量日语借词补充了现代汉语词汇,促进了汉语词汇系统的自我更新能力。

(5) 从内容上看,由于日本强势产业的倾斜性影响,日语借词全面渗透社会文化生活。语言的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倾斜性,即自经济发达国家向经济不发达国家倾斜,并且强势产业的影响力尤其明显。如“宅”“萌”“控”等词极富表现力,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故一出现便很快被大家接受,并由此催生了相关的文化产业。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近年来,随着汉语新词语的产生渠道进一步扩大、产生方式进一步多样化,尽管整体上看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力较日语借词第一次引入高潮而言有所减弱,但是与第一次引入高潮的纯粹“拿来主义”不同,第二次引入高潮更注重外来语的“基因”分裂和词汇扩展(二次造词)。如果说第一次引入高潮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产生的一次日语借用的空前盛况的话,那么第二次引入高潮才是日语本身影响汉语的真正实力

体现。较之过去这种融合式的“汉语化”影响，更稳定、更广泛、更深入，可以说这种词汇借用带来了语言文化间的深度交流。正是这种异域文化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语及汉文化的繁荣。就汉语词汇研究来说，第二次日源外来语的借入，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探索机遇和观察视角，便于我们从中揭示隐藏于汉语新词中的日语借词及其成分的演化路径、机制和动因。

## 第二节 本书基本概念界说

古人对“正名”的问题非常重视，《论语·子路》曾言“必也正名乎”“正名者，辨正名分也”“名不正则言不顺”，现代术语学也同样强调“正名”。作为一门学科，“正名”的问题十分重要，这不仅涉及一个概念或一个术语的问题，而是关乎一门学科整个体系的建构问题。此外，它涉及命名原则、概念术语的内涵和外延的合理性，还涉及术语的科学性与体系性，甚至涉及术语的国际对接问题。为此，有必要对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和术语做一界定。

### 一、现代汉语与当代汉语

#### (一)“现代汉语”界说

在讨论“当代汉语”这一概念的时候，不得不涉及它与“现代汉语”的划界与关系问题。关于二者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尚存分歧。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开山之作，该书第一章绪论专门对“国语”（现代汉语）做了界定，认为“国语”乃使用区域最广、流传时间已久、通行于现代社会的

普通话（旧称“官话”）<sup>①</sup>。该书虽然没有论及现代汉语的分期问题，但指出了—个历史事实，即向来学习国语的人都以北京话为标准。1932年经民国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以北京语音作为拼读国语的标准<sup>②</sup>。这是因为北京话是符合上述“国语”定义中提到的四个标准条件的一种地方话。显然黎锦熙（1924）只是对“国语”进行了界说，而没有言及分期的问题。

关于现代汉语的分期问题，王力（1957）认为：现代汉语即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的汉语<sup>③</sup>，广义上指汉语各大方言，狭义则专指现代普通话。从汉语史的维度看，现代汉语由近代汉语（13至19世纪）发展而来，特点表现为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大量增加复音词等<sup>④</sup>。

邵敬敏（2001）指出，现代汉语应该是从20世纪开始，—般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sup>⑤</sup>。

蒋绍愚（2005）认为，“汉语史”应该包括现代汉语。但学术界似乎形成了一个共同看法：汉语史包括“汉语史”和“现代汉语”两部分，汉语史的研究仅限于现代汉语之前的汉语发展史。长期以来，这种把现代汉语排除在汉语史之外的分期观点，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共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不应该的<sup>⑥</sup>。

何九盈（2007）对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进行了总结，将现代书面语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862—1894），“夷语”“夷文”开始冲击中国语文；第二阶段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2.

②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2.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35.

④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35.

⑤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

⑥ 蒋绍愚·关于汉语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J]. 汉语史学报，2005（1）.

(1895—1917), 梁启超“新文体”风靡全国; 第三阶段(1918—1949), “文言弥留, 白话学步”; 第四阶段(1950—1979), 语文规范加强, 语文内容政治化; 第五阶段(1980—), 语文地位提高, 语文观念大开放<sup>①</sup>。何九盈指出这五个阶段就是现代汉语书面语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刁晏斌(1992)在国内外首倡“现代汉语史”的研究, 他认为, 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有其阶段性的特点, 因而是可以分期的。他认为现代汉语可以初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49), 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二阶段(1950—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 第三阶段(1967—1976), 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四阶段(1977—), 改革开放至今<sup>②</sup>。后来刁晏斌(2000)在坚持原分期观点的基础上, 又补充说: “如果分期不必过于苛细的话, 二三两个阶段也可以合而为一, 视为同一阶段中的两个部分。”<sup>③</sup> 此外, 郭伏良(2001)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汉语新词语产生的情况, 提出了个人的分期: 第一时期(1949—1965), 第二时期(1966—1976), 第三时期(1977—)<sup>④</sup>。

## (二) 何谓“当代汉语”?

现代汉语的界说与分期, 直接涉及人们对当代汉语的认识, 所以学界在讨论当代汉语的时候, 往往都无法回避它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

① 何九盈. 汉语三论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16—17.

② 刁晏斌. 关于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研究的构想 [J]. 语文建设通讯, 1992 (36): 66.

③ 刁晏斌. 论现代汉语史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6): 69—73.

④ 郭伏良. 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研究 [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21.